# 儒法斗争与我国本草学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研究所一室理论学习组

# THE STRUGGL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IN REL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HERBAL SCIENCE IN ANCIENT CHINA

THEORETICAL STUDY GROUP OF 1ST LABORATORY OF PEKING INSTITUTE OF BOTANY, ACADEMIA SINICA

我国本草学是我国劳动人民同自然界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在古代不仅是一门药物学,也是我国古代的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学。在过去,它对于我国世世代代劳动人民防治疾病、利用植物资源,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今天,它仍有重大的实用价值和科学意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我们一定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认真重视对我国本草学的研究。我国的本草学起源很早,历史悠久,约两千年前,我国有史可考的第一部本草——《神农本草经》诞生以来,包括综合本草、食物本草、单味本草及地方本草的书不下四百种(可惜有许多已遗失了),书之多,内容之丰富,是世界罕有的。

我国本草学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唯物论同唯心论长期斗争的历史。我国的本草学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产生和发展的,毫无例外,它同生产和其它科学技术发展一样,总是要受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同儒法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在今天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和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大好形势下,结合本学科的实际,研究本草学发展的历史同儒法斗争的关系,总结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古为今用"**,对于我们开展科技领域的革命大批判,肃清孔孟之道和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在科技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动我国药物学和植物分类学的发展,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都有一定的作用。

## 一、实践出真知,劳动人民是创造本草学的主人

重视实践还是轻视实践,实质上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的问题,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不同哲学观斗争的根本问题,也是法家和儒家两种自然观斗争的根本问题。

儒家否认自然界的物质性,鼓吹"天人合一"、"天生万物"反动的"天命观",把认识的范围禁锢于修身养性,宣扬"生而知之"、"良知"、"良能"、"宇宙便是吾心"等一套谬论,认

识事物当然就完全可以“不假外求”了，决定他们鄙视生产劳动、十分轻视实践的本性。反映在我国本草学的起源上，儒家则认为医学、本草是“天生”的“圣人”创造的，或“医起于巫”。这完全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说法。

与此相反，历代的法家和进步的自然科学工作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天人相分”，承认客观世界独立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唯物论自然观。东汉法家王充在驳斥“生而知之”谬论时提出：“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因而重视生产劳动，重视实践。

药物的起源，来自劳动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活动，我国的本草学是我国劳动人民同疾病长期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因此，它的产生是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一个胜利。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对本草知识的认识是离不开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个基本实践活动的。我们的祖先，最初在寻找食物过程中，往往因误食有毒物质而发生中毒现象，也有因吃某些物质使疾病减轻或消失。在汉代《淮南子》“有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在唐代《史记补三皇本记》中有“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神农”不是指具体一个人，而是我国古代原始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时代名称，是当时人民群众的象征，我国古代有伏羲、燧人，神农时代之说。这句话正反映了我们的祖先，从渔猎、畜牧时代进入到农业的神农时代，即在寻找食物和认识食物——所谓“尝百草”的长期艰苦的实践过程。这些传说，虽具体的人和事都不尽可靠，但却可以说明本草知识起源于生产实践活动，并在上古原始社会就开始有了本草知识的萌芽。但在原始社会中，人类生产力很低，生产活动范围狭小，本草知识的积累受到了很大限制，又无文字，所以大部已失传。后来到了奴隶社会，生产力虽有很大的提高，也开始有了仓颉象形文字，但奴隶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艺术，几乎完全被奴隶主阶级所攫取；另方面，统治者大力提倡“敬天崇祖”[1]迷信思想，代替了原始社会的“图腾”[2]崇拜，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巫”[3]术特殊阶层，成为他们欺骗人民的工具，这就阻碍了本草知识的积累。到春秋战国时代，即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生产力发展，本草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多，人民群众逐渐识破了巫医的骗人把戏，人们才将一些本草知识经验记载于一些书中，如周秦间的《山海经》中记载植物一百多种中就有这样的记述：

文茎(木)食之可已聋(即可治耳聋——笔者注)，

葀蓉(草)食之使人无子(即可作避孕药)，

杜衡(草)食之已瘿(即可治大脖子囊状瘤)，

丹木(木)食之已瘅(蛋音，因劳累造成的病)，

苦辛(草)食之已疟。

类似的记载，在其它书中还很多。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本草知识是零星、分散的，

[1] “敬天崇祖”——叫人民敬上天崇拜奴隶主阶级统治者，对上天和统治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2] “图腾”——原始社会中，各氏族部落把一种自然物(如鹿、狼、龟等)作为他们的血统的标记加以崇拜，认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3] “巫”——这是奴隶社会为统治阶级所提倡，并成为统治人民的帮凶的特殊阶层。“巫”自称能与鬼神交通，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专门用占卜类似方法来治病的人叫做巫医。

还停留在经验阶段，没有形成较系统的专门本草学。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以前的漫长时期内的本草历史，大致可认为是实践知识积累阶段，为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时期——启蒙时期的基本特点(《我国本草学史分期及其主要著作》表附后)。

到了西汉(封建社会的前期)，这时法家路线占统治地位，国家得到进一步统一，农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进步，文化事业也相应发展。随着人们对治病用药实践经验的积累日益丰富，及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医疗技术对社会影响的不断扩大，沉重打击了巫祝迷信势力，从而推动了本草的迅速发展。这才使各地分散零星的本草经验得到统一整理、总结和提高的可能。医药事业的发展，从过去以针石等外治法和单味药治病，发展到以方剂(即多味药相互配合使用)治病，这对本草从理论上总结提高创造了直接有利的条件。我国有史可考的第一部本草学——《神农本草经》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完成了较系统地总结西汉以前劳动人民本草知识经验的历史任务，标志着我国本草学的正式形成，从而奠定了祖国本草学的基础。

《神农本草经》把 365 种药物分成无毒、无毒或有毒以及有毒三类，使人们用药在临床上掌握了必要条件；总结了按药物的性能的“气味”与病机寒热相适应的规律；并且明确了每种药物的性能作用及主治范围等。由于这些知识的获得是来自广大劳动人民的实践，因此所载药物名称及药效，大部延用至今。如大黄下泻，麻黄定喘，当归调经，常山治疟等，均为千百年临床所证明，不少已为现代科学实验所证实。如常山(虎耳草科)有治疟之功，现在也证实常山碱杀疟原虫的效力，比奎宁高150倍。但是这些朴素的理论，也正象毛主席指出的：**“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因此，他们得出的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或是错误的。《神农本草经》正是这样的情况。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此书还存在许多糟粕，如由于受“天命论”的影响，把药物按上、中、下三品形而上学的分类法，什么“上品养命以应天”，“中品养性以应人”，“下品主治病以应地”；写进了许多养生、服石、成仙等唯心主义的谬论，这是应当批判的。

在此以后本草学发展的历史也说明，凡是比较有成就的本草，也都是作者长期坚持实践，注意总结群众的经验的结果。如梁代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包括《名医别录》)，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宋代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和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等，都是我国自汉代《神农本草经》以来有名的本草经典著作，各有所革新创造。他们虽处的时代不同，社会地位也不完全相同(大多数是医生)，但他们都十分重视实践，广泛深入调查研究，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重视总结群众经验，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出来简述一下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李时珍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一位科学家，他的一生活动和《本草纲目》全书，闪耀着劳动人民创造医药学的智慧与光芒。《本草纲目》全书 52 卷，190 多万字。李时珍打破了一千多年传统的迷信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对前人本草著作进行了许多有益的订正，又着重总结吸收了宋代以来四百多年的群众创造的经验，为我国本草学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李时珍为什么会取得如此重大成就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走出去向群众学习，长期坚持实践的结果。

在行医实践过程中，李时珍向群众学得了很多经验，如他在一次行医时，采用农民告诉他的“牵牛花子有下泻作用”的偏方，治好了一位老大娘患有30多年长期便秘症。这件事给了他很大启发和教育，使他感到劳动人民中有着丰富的医药经验，这是过去本草书中找不到的。相反，他却发现旧本草中存在着不少错误，最为混乱的是植物药，多物同名（如“美草”乃是甘草、旋花和山薑的三物同名），异名同物（如南星、虎掌同物分成二种），甚至张冠李戴（如把卷丹写成百合）等现象多达上百处，他认为对药物的解释混乱或分类失宜，将会带来医疗中不良后果，这就使他感到有重编一部本草的必要。

李时珍编书不久就碰到新的困难，最感头痛的是对植物药的形状和生长情况，缺乏明晰的概念，怎么办呢？他感到单靠“无书不读”的方法去研究不行了，要像他父亲李言闻调查艾叶写出《艾叶传》和他自己去蕲州地区实地调查蕲州蛇写出《白花蛇传》那样，必须走出书房，到群众中去采访，去深山实地观察。他行医，采药，翻山越岭，走遍了大江南北，群众听说他重修本草，便把自己经验和药草提供给他，在群众的帮助下，使他搞清楚了不少历史争论不休的问题，如萍、蘋、蓉、蓴之间的区别，这样，他对植物药形态特征的记载，比较详细确切了。对药物的疗效记载，不少都是根据群众的经验，并经过他多次临床试验，长期实践写出来的，所以比较可靠，至今仍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不少已为现代科学实验所证实，如曼陀罗碱的麻醉作用，大风子油治麻风病等。

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的成功再一次表明：一切真知只能来源于实践，劳动人民是创造科学的主人。李时珍的渊博的本草学知识及其伟大成就，当然不是“生而知之”的“天才”、“圣人”，恰恰相反，主要是由于他在长期努力实践中，逐步地学会了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这个思想武器，去分析总结群众的经验和自然现象的结果。这充分证明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真理的无比正确，表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才能，他们才是创造本草学的真正主人。

## 二、儒法斗争对我国本草学发展的影响

我国的本草学是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劳动人民发展本草学的斗争中，儒家和法家路线起着截然相反的作用。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有如下几点初步的体会：

从研究我国本草学发展历史中，大致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在更换一个大的朝代的初期，往往本草学较为活跃、兴盛。如《神农本草经》诞生在前汉，唐代初期的唐《新修本草》，宋初期的《开宝本草》、《嘉祐本草》（以后经唐慎微修改成《证类本草》），明初的《救荒本草》以及清初康熙年间的《广群芳谱》等，都是出现在更换一个大的朝代的初期。在这些时期以前，往往是前王朝末期阶级矛盾激化，引起大的农民运动，如汉代之前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清代前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等。处于这些时期，一般是法家路线占统治地位，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实施一条前进、革新的路线，重视耕战，比较重视实践，国家得到统一。所以，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科学的繁荣，使我国本草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十分兴盛，这绝不是偶然的。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如，唐代法家武则天执政时期（包括唐高宗时期，受权武则天“决百司奏事”，实际上由武则天掌握大权），提倡种植和研究药材，并命令全国各地献药献方，由李

勣、苏敬和医官等 22 人，用两年时间就编写完了著名的唐《新修本草》。

而儒家代表历史上一切反动没落的阶级和政治势力，推行一条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他们敌视革新，轻视生产，鄙视劳动人民，对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极坏的阻碍作用。如在明朝中叶（16 世纪），儒家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过程中，不但得不到政府的一点支持，反而受到皇宫内那些热衷于研究仙丹，以迎合统治者追求长生不老的心意的太医官讥讽为卑下的"草泽之医"。书编成后，他的儿子李建元把《本草纲目》献给朱翊均皇帝时，结果只落得"书留览，礼部知道"七个字批语，搁置一旁的悲惨遭遇。但是，在明万厉初法家代表人物张居正执政的时候，就不同了，张居正主张变法革新，推行法治，发展生产，巩固国防，人民生活才得以安定。这对于李时珍后期采药、调查、编写等活动创造了条件。

李时珍的一生活动，明显地表现出尊法反儒倾向。在《本草纲目》中，他敢于纠正过去孔老二信口开河说的"萍实"，应该叫做"萍蓬草"。比李时珍早一些的儒家王阳明，坐在竹子面前冥思苦想了七天后，说不出竹子生长的规律，于是提出了"心外无物"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谬论。而李时珍对竹子进行了长期调查和观察后，正确描述了竹子由鞭长出笋、由笋成竹，开花结实的过程，并写出了十几种竹子及其用途，这是对当时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唯心论的有力批判。相反，他对王充、柳宗元、王安石、沈括等法家的著作，在《本草纲目》内多处引用。李时珍对当时昏庸腐败的统治者为追求长生不老，社会上刮起的一股炼丹成仙邪风，敢于坚持真理，直斥其非："此皆方士谬说也"。在水银条下他写道："……本经言其久服神仙……，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即残废——笔者注），而丧厥躯（即毒死），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对当时朱厚熜皇帝服"金丹"丧命，他说："求生而丧生可谓愚矣"，这也是对孔孟之道鼓吹的"上智下愚"谬论的绝妙讽刺。

李时珍革新、前进思想的最突出的表现，还在打破了一千多年来传统的迷信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基本上是按药物的本质、习性和生态作为分类的基础。他把药物分成 16 部，部下又分成 62 类，"析族区类，振纲分目"；他把矿物药归纳为金、玉、石、卤石四类，每类的排列顺序，与今天药物化学中无机药物分类大体相似；对动物药的分类，大体上按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顺序排列，分为虫、鳞、介、禽、兽、人六部，他把猿猴列入兽部寓怪类，并指出它与人相似的某些特点，是一种高级的动物。这里包含着进化思想，也是对当时宗教迷信思想有力的挑战。

他把植物药分为五部三十类。这五部中按习性分有草部及木部（其中又按植物生长习性、生化及经济用途和生态环境分成若干类），相当于现在说的草本及木本植物；按经济用途分有谷部、菜部及果部，相当于我们现在称的谷类作物、蔬菜及果树园艺植物。

这种分类方法，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特点，是一种实用的科学分类方法，便于应用，至今，在许多场合，我们仍在采用。这比起过去长期沿用迷信的三品分类法来，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他打破了唯心论的束缚。他在书中公开声称，他的分类方法是"从微至巨，从贱到贵"，即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例如过去龙被视为神物，是"天子"的象征，但仍被李时珍列入鳞部，处于较凤、猩猩为低的地位。对野象的驯化，金鱼颜色的变化，使他觉察到生物的变异现象，并认为可以用人工方法去影响这种变异。李时珍对植物的分类方法，在当

时，不仅在我国是一个创新，而且在世界上也是较为进步的。

李时珍采用植物名称的原则，也是比较正确的。他在《纲目》中，所采用的一千多种植物名称(正名)，找不出一处是相同的。主要是根据时代先后，以最早的名称作为正名，列出一个正名和若干异名，并均注有其出处及该种植物的地理分布；但在下述情况下，即因异物同名，物种不可靠或因名出自时间太早而又被以后通俗名代替者，则废弃较早的名称作为异名，保留较晚流行的通用名作为正名。如苍耳(正名)，在《诗经》中称着"卷耳"，在《本经》中作"枲耳"，后来的人多用《尔雅》中的"仓耳"。又如车前草(正名)，在《诗经》中称为"芣苢"，李时珍则采用后来通用的车前草作正名。这样，就减少了种名的混乱，便于准确辨认和应用植物资源，是一种科学的植物命名法，现今仍可适用。

由于时代的局限，李时珍不可能彻底摆脱儒家唯心论思想的影响，他的《本草纲目》还存在着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甚至有因袭旧说，迷信糟粕。例如他相信了萤火虫是腐草或竹根变的，孝子的衣服烧成灰可以治鼻疮等，但这毕竟是次要的，也是难免的。

相反，比李时珍仅早几十年的时候，明孝宗朱祐樘命令医官40多人编的一部御制《本草品汇精要》，是在儒家路线指导下编写的，书中有浓厚的"宿命论"唯心色彩，因循守旧，除了"悉尊神农本草经分为三品"外，甚至把大儒司马光的死党邵雍编的《皇极经世书》极端唯心主义的分类法引进了本草学。这部是以儒家唯心论作指导，鄙视劳动人民，轻视实践，靠坐在书房考证抄书编纂，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所作为，只好将稿存入皇宫里。这是一个极好的反面例子。

从上面所例举的一些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家路线对我国本草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儒家路线的严重阻碍作用。从而使我们加深了对"**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伟大真理的理解，这也是本草学发展史上所证明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 三、努力发掘我国本草学遗产并加以提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我国本草学历史悠久，内容十分丰富。毛主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我国的《神农本草经》、晋朝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唐《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是当时世界上较高水平的本草著作或地方植物志。这些本草著作，它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至今仍有着重大的实用价值和理论研究意义。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用现代科学方法实验，对我国本草中的许多种药效一一得到证实，并从中发现了很多能治高血压、冠心病、肝炎、气管炎、癌症等疑难病的药物。因此，我国的本草著作，早就成为中外学者寻找自然药源的重要参考文献。

但是在以前，特别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儒家路线处于统治地位，反动统治者腐败无能，不仅对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包括许多本草著作的原版，都未加妥善保存，且对我国许多科学发展史和成就，都被歪曲和抹煞，这说明了儒家路线的卖国投降、崇洋媚外，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和破坏作用。解放后，刘少奇、林彪一伙，贩卖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破坏和干扰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的贯彻，致使我国古代本草学的遗产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掘，这个任务，现在要靠我国广大工农兵

和医药学、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努力完成。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

**我国本草学史分期及其主要著作**

| | | 书　　名 | 卷　数 | 药　种　数 | 时　　代 | 著　　者 |
|---|---|---|---|---|---|---|
| 第一时期（原始及奴隶社会） | 本草启蒙时期或实践知识积累阶段 | …… | | | | |
| | | 诗　　经 | | 约 200 | 西　周（前 600） | 群众诗歌集 |
| | | 山 海 经 | | 约 100 | 周 秦 间（约前 500～300） | 无确考作者 |
| 第二时期（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本草学形成及发展提高时期 | 第一阶段 奠基阶段 | *神农本草经 | 3 | 365 | ? 西 汉（前 202～公元 8） | ” ” |
| | | 南方草木状 | 3 | 80（植物） | 晋（约 300） | 嵇　含 |
| | | 名医别录 | 3 | 365 | 南北朝梁代（502～549） | 陶 弘 景 |
| | | *神农本草经集注 | 7 | 730 | ” | ” ” ”（将《本经》和《别录》合并加注而成） |
| | 第二阶段 繁盛时代 | *唐新修本草 | 54（药图）25 | 844 | 唐，显庆 4 年（659） | 李勣、苏敬等 22 人（官修） |
| | | *本草拾遗 | 10 | （新增药约）400 | 唐，开元 27 年（739） | 陈 藏 器 |
| | | 蜀本草 | 20 | | 后　蜀（934） | 韩保升等（官修） |
| | | 详定本草 | 20 | 983 | 宋（963） | 赵匡胤命医官将唐本草、蜀本草两书注释而成（官修） |
| | | 开宝本草 | 21 | 983 | 宋，开宝 6 年（973） | 马志、刘翰等（官修） |
| | | 嘉祐补注神农本草 | 21 | 1082 | 宋，嘉祐间（1061） | 掌禹锡等（官修） |
| | | 嘉祐图经本草 | 21 | 1082 | ”（1062） | 苏　颂等（” ”） |
| | |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即证类本草） | 32 | 1558 | 宋，元祐间（1086） | 唐 慎 微 |
| | | 大观本草 | 31 | | 宋，大观间（1108） | 唐慎微原著，艾晟增修（官修） |
| | | 政和新修本草 | 31 | | 宋，政和间（1116） | 唐慎微原著，曹孝中校正（官修） |
| | | 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 30 | | 宋，绍兴间（1159） | 唐慎微原著，王继先等校（官修） |
| | | 经史证类大全本草 | 31 | | 金，贞祐间（1214） | 唐慎微原著，福昌孙夏氏刊 |
| | | 救荒本草 | 4 | 414 | 明，洪武初（1368） | 朱橚（朱元璋的第五子） |
| | | 本草品汇精要 | 42 | | 明，弘治 16（1503）未刊 | 施钦等（官修），内府藏本，未刊行。清康熙时重修刊行。 |
| | | *本草纲目 | 52 | 1892（其中植物 1195） | 明，万历 24（1596） | 李时珍，1578 年编成书，1596 年首出金陵版 |
| | | *本草纲目拾遗 | 10 | 720 | 清，乾隆 30（1765） | 赵 学 敏 |
| | 第三阶段 近代本草学阶段 | *植物名实图考 | 60（包括长编 22） | 1714 | 清，道光28（1848） | 吴 其 濬 |
| | | …… | | | | |

* 为我国本草经典著作。

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植物分类学和药物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在当前要特别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努力改造世界观、坚持实践，坚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唯物辩证法，就一定能在本世纪内创造出我国的新本草学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植物分类学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